

Shanghai GONGXIAO HEZUO JINJI

ISSN 1674-2516
CN 31-1620/F

上海供销合作经济



上海市金山山区供销合作社
上海金山商业发展集团

4

2023
总第221期

2023年8月28日版

ISSN 1674-2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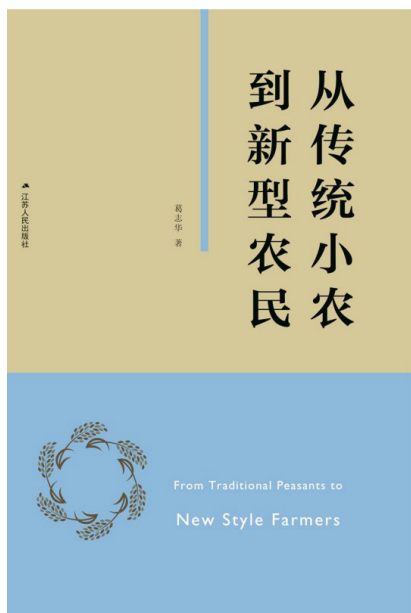
9 771674 251234

08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的农民转型之路探析

读《从传统小农到新型农民》有感

◎ 苑鹏



党的20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在当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6.7%的情形下,加速农民的现代化转型,推进农民的全面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难中之难”,也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

标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中之重”。葛志华《从传统小农到新型农民》一书,紧扣现代化与农民这一主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自由观为指导,“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这一宏大历史叙事背景出发,借鉴中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要义,系统全面地梳理“农民的前世与今生”,多维度分析“现代化途中的农民境况”,积极借鉴日、韩、法等典型小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转型的经验与教训,阐释现代化应是既“化物”又“化人”的核心观点,并进行系统论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我国农民转型与发展的路线图。

一、谁是农民:传统社会到现代 社会相对稳定的小农制度

《传统农民到新型农民》开宗明义指出,“弄清‘谁是农民’,既是研究‘三农’问题的逻辑起点,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前提”。然而正如书中所言,对于农民的定义莫衷一是,“很少有哪个名词像‘农民’这样给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农村社会学家造成那么多困难”。欧美学者在讨论农民概念中,由于观点差异太大,还曾一

度发生过激烈争论(秦晖,1999)。但如果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就会发现,农耕是文明的基础,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农耕文明是人类史上的第一种文明形态(葛志华,2023)。人类祖先就地取材、使用手工制作的简单工具集体从事粮食作物的生产、实现群居化的定居生活,使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变为食物的生产者,由此出现了农民群体,也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社会群体。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自战国时期以来,中国逐步发展出了以精耕细作、自给自足为代表的小农制度,小规模家庭经营是中国农业的本源性制度(习近平,2022),这一体制延续了两千年之久。虽然朝代迭代更替不断,但小农制度一直保留下来,并成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葛志华,2023)。也因此,谈及历史上的农民,更多谈到的是小农制度。这种小农制度具有三大基本特征:一是生产经营的规模小;二是以满足家庭消费为主而生产,生产单位与消费单位高度吻合;三是兼业经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

足,依靠非农收入平衡家庭支出(葛志华,2023)。小农制度不仅成就了
中国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历史,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形成的宗法一体化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在停滞的同时又保持着难以摧毁的生命力(金观涛、刘青峰,1984年)和“独尊儒术”的国家思想意识形态与之无不相关。而农业生产自身,也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不前,出现无增长的“内卷化”(黄宗智,2000)。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纳入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新体系,陷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黑暗境地,开始走上被动式的“应变性现代化”道路(罗荣渠,2004)。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广大贫农开展土地革命,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全面推行耕者有其田制度,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全国建立起了土地小农所有制。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目标,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农村先后实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摧毁了小农制度,在农村建立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目标,但是也付出了牺牲农业、农民的沉重代价。1978年末,中国农业人口占比84.2%,城市化率仅有17.9%,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以乡村户籍人口作为总体推算,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人。

改革开放后,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强调社会主

义必须摆脱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家庭承包经营在农业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最终写入了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从此广大农民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下无迁徙权、无生产经营决策权的单纯劳动者,重新成为独立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小农制度被重新确立起来。

经过改革四十余年的不懈探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并初步形成了引导小农户走上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基本政策框架。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促进广大小农户增收,让农民能够分享现代化的成果,成为新时代“三农”的中心工作。

二、走向分化的农民群体:探索多重路径的现代化转型之路

大国小农、超小规模农户仍然是当前我国农业经营的基本面。按照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农业农村部政策与

改革司发布的《2020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显示:2020年耕地在10亩以下的农户仍有23210.7万户,占比85.1%。另据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经济社会调查项目“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对东西地区10个省、50个县3800余农户的抽样调查显示:样本农户户均承包土地10.58亩,其中劳均年龄超过50岁,初中教育程度占主体;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15岁及以上样本人口文盲率高出2个百分点,18-22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9个百分点。超小经营规模、老龄化、低学历化是当前中国农户的突出特征。

经过改革40余年的发展,中国农户群体已经并正在更加快速地分化着,初步形成了三大类:一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专业农户,以各类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为代表,按照农业农村部统计,2022年纳入名录管理的家庭农场超过400万家,他们已经实现企业化、专业化经营,是“形式小农”;二是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基本实现非农化和半城镇化的名义小农,以进城农民工群体为代表。按照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最新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9562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达到22.6平方米,45.7%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85.2%对本地生活非常适应和比较适应,反映出农民工群体与所在城市较高的社会融合度;三是构成农户主体的兼业化小农户,其家庭收入主要来自非农的工资性收入和以农业为主的家庭经营收入,两者约占其收入构成的3/4以上。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1年农村居民

可支配收入 20133 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为 41.96%，也是农民增收的主要贡献源，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 34.63%，其中六成来自农业经营收入。

对于广大兼业小农户的转型出路，学术界存在一直存在着较为激烈的争鸣。有学者认为，应跳出生产力导向的“小农消亡论”预设框架，推进农业向生态化、个性化以及生活化的现代化变革，走上以小农为主体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之路。而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应促进农地经营权向种田大户集中，公司农场将成为中国未来农业微观组织的重要形态，还有学者认为应把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核心来培育。较为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引导农户走组织化的道路应成为重点，农民合作社是关键载体（魏后凯、苑鹏、芦千文，2022）。从近几年中央的政策导向看，以分工深化为导向的土地规模经营和服务规模经营齐头并抓，一方面因地制宜，加速推进土地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小农离土非农化；另一方面鼓励扶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健全完善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在地小农提供全产业链服务，探索多模式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对接的发展路径。

三、未来方向：农民实现去身份化的职业化

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上，农民的非农化、城镇化和市民化三位一体，农民非农化与农民职业化相伴而生（葛志华，2023），“去身份化”和加速农民

的职业化，应成为未来加速最广大的兼业小农户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它不仅是建立起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机制、大众民主的政治制度、高流动性的社会系统和崇尚自由、平等的文化系统，也确立起个人的行为理性和自主性（谢立中、孙立平，2002）。因此，现代化的本质应是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在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彻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加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培养农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农民形成与新时代发展相适应的自主独立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取向，全面参与到社会化的大分工中，成为有知识、有技能的专业化生产者，最终实现从身份农民向职业化劳动者身份的转型和嬗变。

总之，站在传统农民变迁的视角看，现代化的过程是农民非农化、职业化、组织化、市民化的过程，是传统小农脱胎为职业农民、“历史弃子”蜕变为“时代宠儿”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的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这就是葛志华《从传统小农到新型农民》给我们的启示。我和葛志华素昧平生，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读到此书，不仅受益于书中的真知灼见，更受益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利用业余时间潜心做学问的执着精神，令人敬佩也弥足珍贵。虽然书中个别观点值得商榷，个别论证存在一定的重复，但瑕不掩瑜，全书的主题思想不由得使人联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学部委员翻译的、法国著名作家 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一书的开场白：“一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

处，这就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两本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异曲同工之妙，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 and 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以及对于拓展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路径的独特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版。

葛志华：《从传统小农到新型农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 年版。

秦晖：《耕耘者言——一个农民学研究者的心路》，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转引自：杜玉春、赵德余、梁鸿：《建构农民概念的逻辑——基于“结构—过程—属性”框架的动态分析》，《农业经济管理》，2022 年第 4 期。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 年版。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

魏后凯、苑鹏、芦千文：《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研究的历史演变与理论创新》，《改革》2020 年第 10 期。

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 年版。

白描、苑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全面发展的制约因素与推进路径》，《改革》2022 年第 12 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二级研究员）